

西北局高幹會： 延安整風中的民主作風典例

• 王龍飛

摘要：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簡稱「高幹會」），無論是會期還是規模，在中共的歷史上都無前例。不過，如此重要的會議卻被更為宏闊的整風運動所掩蓋，學界對其關注亦較少，而本次會議涉及的反特、審幹的內容又常常被過於突出強調。本文基於豐富的史料，着力發掘這次會議台前幕後的諸多細節，盡可能全面地呈現會議內容，並側重從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次會議，希冀能豐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認識及糾補某些偏見和缺漏。本文認為，高幹會的組織籌備和議程設置、特別是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處理，某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健康正常的組織文化，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高幹會是一次在解決黨內分歧和形成共識方面具有典範意義的會議，而這也正表明延安整風的實際面相遠不止是審幹、肅反。

關鍵詞：西北局高級幹部會 組織文化 延安整風 陝甘寧邊區 陝北肅反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又稱「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以下簡稱「高幹會」）在延安開幕，至1943年1月14日閉幕。這次會議歷時88天；除去節假日和因故休會，實際開了65天，會期之長史無前例。這次會議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一般被視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由於與會者不僅有西北局縣團級以上幹部，還有一大批來自其他地區以及當時在延安學習的高級黨政軍幹部，特別是大部分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均出席了會議，因此這次會議的地域意義遠遠超出陝甘寧邊區。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世的眼光來看，這都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

* 三位匿名評審對本文提出了中肯而又誠摯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從組織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高幹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毛澤東所說：「邊區高幹會（黨政軍民三百餘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歷史、當前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①有論者甚至認為高幹會是「延安整風整頓黨風階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②。不過，在史學研究中，如此重要的會議卻被更為宏闊的延安整風所掩蓋。在有關延安整風的論述中，一般都會提及此次高幹會，但以高幹會為核心論題的研究較少。即便是對這次會議的專題研究，總體來說也較為薄弱，或許由於史料不足等種種原因，相關記述主要依靠一些零星的回憶錄以及各種文件中的夾帶性描述^③。此外，在論及這次會議時，很多記述的重心也有所偏向。例如，高華在其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中多有提及此次高幹會，但其主要着墨點在於本次會議與反特、審幹相關的內容，以至於被呈現出來的會議面貌近乎於一個預先設計好的審幹搶救運動的發動會^④。筆者認為，這是有失偏頗的。本文將基於更為豐富的材料，以呈現會議的更多細節，着力於從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的角度揭示會議的進程。本文認為，雖然此次會議後不久整風運動即進入了殘酷的審幹階段，但並不能按着後來的情形倒推高幹會，尤其不能片面擷取和放大會議中的相關內容用以滿足論述需要。事實上，如同這次會議內容和議題之豐富一樣，延安整風也遠不止是審幹、肅反這樣的單一面相。

一 會前：中央直接領導籌備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整風運動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中央黨校、不包括軍事院校的各學校及陝甘寧邊區五個系統分頭進行，並確定了各個系統的指導者，其中陝甘寧邊區系統由任弼時和高崗負責^⑤。為了統一整個西北地區的領導權，早在1941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簡稱「西北局」），委託任弼時、陳雲商定西北局成員名單，同時決定中共陝西省委劃歸西北局領導。之後，中央書記處行文通知：西北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蕭勁光、陳正人為委員，高崗為書記^⑥。自此，西北局正式成為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的代表機關。

1942年4月14日，西北局會議宣布陝甘寧邊區總學委正式成立，並決定邊區政府各個子系統內整風運動的負責人。會議規定從4月20日開始，用三個月時間研究中宣部指定的二十二個整風學習文件^⑦。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西北局的黨、政、軍工作，王稼祥負責軍隊編制工作，準備在10月中旬召開由黨政軍幹部參加的西北局高幹會，以整黨、整財、整政、整軍、整黨政軍民關係等「五整」為主要議題，以實現「整頓三風」、「精兵簡政」兩個目標^⑧。一周後，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於10月5日召開西北局高幹會，地方縣委書記以上、軍隊團以上幹部參加。這次會議還決

定《解放日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同時也是西北局的機關報^⑨。之所以決定召開主要由高級幹部參加的這個會議，是因為毛澤東特別重視高級幹部的示範作用，他指出：「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⑩

9月1日，西北局發出〈中共西北局於十月五日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重要通知〉，〈通知〉包含議事內容、與會者、會期及注意事項等四個方面的內容。與前述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對照可以發現，議事內容與前者非常接近，但也略有變化和有更加具體的說明：增加了「統一黨政軍民領導問題」一項；關於與會者的規定更明確，即：黨的系統為縣委書記及分委特省委書記，政府系統為黨員縣長及專員副專員，軍事系統為團長團政委及旅長旅政委，並特別說明如旅長不能來則副旅長來，政委不能來則旅政治部主任來；會期預定為二十天。〈通知〉要求與會者必須於10月3日到達延安，並提示與會者提前準備材料與意見^⑪。

不過，會議並沒有按時開幕，而是延後了十多天。這期間相關的準備工作還在緊張進行，10月9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又討論了高幹會的相關問題，決定各種決議草案，可先經高幹會討論，於會議結束前提到中央討論，再交高幹會最後通過。工作會議還就統一財經委員會實際工作的領導，向西北局作出了新的人事提議。同時，會議批准調李維漢到邊區政府工作，並出任西北局委員^⑫。關於財經工作，在9月初至10月上旬這段時間，任弼時和李富春、賀龍等出席財經委員會的會議，討論了邊區公營商業、工業、金融、貿易等問題，形成了財政經濟工作大綱^⑬。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再次召開工作會議，決定組織一個清算黨的過去歷史的委員會，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參加，以毛澤東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同時，工作會議決定組織另一個委員會，負責審查過去被打擊的幹部，陳雲、高崗、譚政、陳正人、彭真參加，以陳雲為首^⑭。西北局則分別於10月6日和15日兩次召開常委會，討論研究高幹會的準備工作，決定了高幹會召開的時間、參加人數、會議程序、議事內容及向大會提交的主席團名單。據此推測，高幹會之所以延期，一個重要原因是會議的準備工作未能在預定時間前完成。前述10月9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高幹會的各種決議草案先提交給會議討論，在會議結束前再提到中央討論，即表明中央還來不及進行成熟討論和形成各種決議草案，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本次會議所要涉及的問題太多。這一點在會議進行過程中也得到了體現，毛澤東的書面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在會議進行了一個多月時還在緊張撰寫中，到會議結束時，原計劃的稅收、節約等內容仍未來得及寫出^⑮。

除了直接的會議準備工作，高幹會會前各部門還組織了相應的調查研究。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召開了一次西北局各地縣組織的工作座談會，中共中央派任弼時、陳雲等及中央政研室王若飛、王鶴壽等參加會議，對西北局幹部隊伍、黨的建設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分析^⑯。西北局宣傳部在固臨縣農村進行典型調查後編印了《固臨調查》一書；林伯渠視察了鄜縣、甘泉兩縣；

中央青委和婦委也到綏德、米脂地區調查，搜集了不少第一手材料，編印了《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中央軍委與留守兵團組成的考察團分五路到各部隊進行調查研究，賀龍召集旅團領導人座談了整軍問題；等等。可以說，高幹會的籌備過程也是一次對邊區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過程，這為會議討論及形成各種草案和決議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隨高崗前往綏德、米脂調查的時為西北局邊區問題研究室工作人員的于光遠稱，他所在的研究室對於高幹會上要討論的經濟問題即負有搜集資料和提出看法的任務^⑩。

毛澤東很關心高幹會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並強調要向工作一線的、有實際經驗的人徵集材料和意見。譬如，關於財經工作文件的起草，毛早於1941年8月19日就寫信給陳正人^⑪：

我要朱理治寫了一報告書，很有些價值，……請向他索一份，以作你們起草財經綱領的參考。在起草此文件前，請與南漢宸，高自立，葉季壯，朱理治及糧食局貿易局諸人加以研討，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方更準確。

邊區參議會和西北局機關都在延安南區，和中央機關所在地楊家嶺南北相距約十華里，中間隔着延河。為了方便指導這次大會，會議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和他的政治秘書師哲一起住在西北局機關「蹲」會，這也反映出中央對這次會議的高度重視。

二 會中：三大問題的解決

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幹會在延安鳳凰山麓的邊區參議會大禮堂開幕。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陝甘寧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學各系統負責幹部97人，分區黨、政及軍隊旅一級的負責幹部52人，縣級黨、政及軍隊團一級的負責幹部117人。在開會期間，延安中央高級學習組的全體成員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二部學員也都到會旁聽。中央黨校一部學員中有相當部分是各地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於七大一再延期，黨中央決定將他們集中到中央黨校學習）。在高幹會開幕、閉幕和討論邊區經濟財政問題時，政府和財經機關的黨外負責人、技術幹部也被邀請與會^⑫。

大會開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選舉高崗、林伯渠、賀龍、謝覺哉、陳正人、徐向前、蕭勁光、賈拓夫、方強九人為大會主席團，賈拓夫為秘書長。高崗致開幕詞，說明了這次高幹會的重要意義及其任務。毛澤東在開幕式上作了講話，算是為本次大會奠定基調。他說，這次開會是要大檢查、大整頓，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其中尤其是統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針對有人說進行黨內鬥爭是不合乎中國習慣的，毛回應說，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這就包含着鬥爭，好的

保留，壞的整掉²⁰。遵照毛的指導，高幹會先由各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報告，然後與會者半天閱讀文件材料，半天進行小會或大會討論，逐項進行。

10月21至22日，陳正人向大會作了〈關於整黨整風問題的報告〉，〈報告〉闡述了整黨的目的和原則以及整黨草案的產生過程，同時還論及黨員政策、支部建設、幹部政策、新區同邊區工作問題等較為具體的七個問題²¹。在隨後的幾日，各小組圍繞整黨問題，結合陳正人的報告，進行分組討論。大家討論的主要是組織工作方面的具體問題，甚至在一些瑣碎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如模範黨員的標準、黨內十種「壞份子」的比例等。另外，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沒有展開。這些顯然與毛澤東「大檢查」、「大整頓」的要求不符。對此，毛指示會議主席團改變方針，從「細小末微」的具體問題，轉到集中火力檢討黨內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傾向，特別是自由主義和同黨鬧獨立性的問題²²。關於陳正人的整黨報告，在討論期間，毛也曾致信陳²³：

整黨鉛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問題，康生同志在看過後有些值得考慮的不同意見，提議在討論後暫不作結論，接着討論其他問題。結論可以在閉會前作，而在作結論前中央可以討論一下。請與任（弼時）、高（崗）商量酌定為盼！

以後來的情況來看，這裏的「不同意見」很可能就是康生認為陳的報告太過一般化，沒有觸及不良作風觀念及其思想根源等深層次的問題。

（一）陝北肅反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高崗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要清算邊區黨在中共中央未到陝北以前和內戰後期歷史上的有爭議問題，並以自我批評精神來檢討歷史和現狀。於是，大會主席團決定改變會議的進行方針，停止關於整黨問題的瑣碎討論，把整黨、整政、整軍、整關係結合起來討論，集中力量檢討邊區黨內的思想傾向問題²⁴。接着，11月4至5日，林伯渠向大會報告了整政問題，賀龍報告了整軍問題，高崗報告了整關係問題。

由於觸及到1935年秋「陝北肅反」等重大歷史問題，與會者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幾百人立即投入到熱烈的討論中去，特別是那些曾經受到錯誤對待的幹部紛紛發言，強烈要求中央徹查。為了配合討論，會議還摘要翻印了代表當時錯誤路線的部分文件。邊區黨最有威信的老幹部張秀山、習仲勛、馬文瑞、張邦英、劉景範、賀晉年等人以及其他許多一貫擁護該正確路線者，相繼講話，舉出種種例證，來證明當時左傾路線怎樣危害了革命的工作，危害了黨內團結和黨與群眾關係，要求犯錯誤者承認錯誤；過去曾站在錯誤路線方面但已經覺悟者，也一面進行自我批評，一面要求還沒有完全覺悟者趕快覺悟²⁵。

作為「肅反」的主要責任者，朱理治和郭洪濤成了被批判的焦點²⁶。據于光遠回憶，在大會上首先對朱、郭發難的是時任綏德地委書記張秀山，然後

原先在陝北根據地的開闢者相繼發言，以親身的經歷說明朱、郭等執行的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路線；同時，他們也闡明以劉志丹、高崗為代表的路線的正確性，而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下，路線正確者險被鎮壓^⑳。也就是說，張的發言將對朱、郭關於「肅反」的質詢和批判引向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相較陳正人的報告，會議主題明顯得到了昇華。張後來在自傳中也提到，「會上我的兩次發言引起震動。中央黨校的年輕同志聽後說：在敵後，我們只知道對敵鬥爭殘酷，沒有想到黨內的路線鬥爭也是這麼複雜嚴重，整黨整風真是很有必要。」^㉑張秀山憶述稱彭真和任弼時也高度評價了他的發言，其中彭真認為其發言「有事實，有根據，有理論，以理服人，是一個教育幹部分清路線是非的好教材」^㉒。後來《解放日報》刊發張秀山的〈高幹會雜記〉一文^㉓，可能與他的發言受到廣泛讚譽有關，因為這是該報刊發的唯一一篇個人名義下的會議雜記，且篇幅較大。

11月17至18日，高崗作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在結論中將邊區黨歷史上的爭論定性為路線鬥爭，確認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朱、郭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㉔。高崗的報告經胡喬木、賈拓夫整理，再經討論和修改，最後由黨中央批准，將這個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要求邊區各級黨組織全體幹部和黨員進行深入研究與討論。於此，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定性。

從11月5至20日，先後有四十六人在大會上發言，其中有的人不止一次發言，且發言時間大都較長，達兩三個小時，這也是整個高幹會會期如此之長的原因之一^㉕。而對於郭洪濤、朱理治等人的發言，則伴隨着不斷的質詢、喊聲，甚至哄笑聲^㉖。據當時負責中共中央保衛工作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團長劉懋功回憶，一位被批判者不得不在大會上多次做檢討，但他的認錯態度仍然不好，有一次連毛澤東都氣得在台下站起來嚴厲斥責他，這個人站在台上低着頭不敢吭氣^㉗。劉沒有點名，但根據合理推測，此人不是朱理治，就是郭洪濤。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會場上的緊張氣氛。《任弼時傳》描述說：「在緊張而有秩序的討論中，有好幾次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八時。儘管立冬以後，西北高原氣溫已很低，但會議始終保持着熱烈的氣氛。」^㉘

不過，會議也並非一直這麼緊張。會議期間，八一劇團應邀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大禮堂演出。首場演出《民族魂》，接着是《石達開》和《三滴血》。據參演者回憶，演出結束後，林伯渠、謝覺哉等領導接見了他們，熱情稱讚說：「你們的三本戲內容好，一本是宣傳抗日，一本是反對分裂主義，一本是反對教條主義，緊密配合了黨的整風學習。」^㉙

（二）毛澤東的報告

隨着關於邊區黨歷史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毛澤東適時而作的報告成了新的核心議題。11月21、23兩日，毛結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逐條講解被其視為「我們全黨的聖經」的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㉚。毛在這個時間點做這個報告，顯然是用心安排的。早在11月1日，賈拓夫就去信詢問

何時在高幹會議講解「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次日覆信說：「大約可在十號左右講，那時再商量確定日子。請你將布化十二條及結束語第四第五條按聽眾之數鉛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發與他們研究。十二條譯文要用最近一次師哲譯出的，請注意。」^⑳可見，這次報告是早就打算好要做，只待合適的時機。而高幹會進行到此，熱烈討論的氛圍已經形成，關於歷史問題也進行了系統的清算，是非正誤有了公斷，為此次整風會議向更高層次推進奠定了基礎。于光遠回憶說，這是他聽到的毛澤東最長的一次演講，一共講了三四個半天，每次足足講了四個多小時，一共講了十三四個小時，「十二條一條一條地講，既對斯大林每一條本意作了詳細的講解，又聯繫實際充分地發揮，講得極生動。我聽了也覺得過癮。」^㉑

無論是從當時的出發點還是從實際效果來看，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應該說是整風運動的核心任務。在講演中，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經過21年的鬥爭，可說是布爾什維克黨」，但若以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衡量，則「我們現在還差，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㉒。要完全布爾什維克化，則必須做到領導一元化，反對鬧獨立性，反對自由主義，對黨員而言則是要求增強黨性。關於這一點，毛在看了彭德懷1943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地委幹部整風學習會上作的〈關於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發言的記錄稿後，在「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為國會選舉機構的附屬物……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這句話旁批註：「黨是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工會、合作社、軍隊、政府（與其他階級聯合的）、國會黨團等階級聯合的一切形式，均須受黨的領導。中國黨是照這一條建立的，但在黨員中認識不很深刻。」^㉓毛這裏所提到的「認識不很深刻」的一個典型表現是，當時有些人將黨政軍民平列起來看待，甚至在有些地方，軍隊凌駕於黨委之上。針對這一點，高幹會作出的相應決定是「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於以高崗同志為首的西北局，分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於黨的地委會」^㉔。這也表明，使全黨明確認識黨是無產階級一切組織最高形式這個原則，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其中高幹會上毛的報告顯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在毛澤東報告之後，從11月24到12月5日，大會結合陳正人、林伯渠、賀龍、高崗等人先後做的整黨、整政、整軍、整關係等報告，集中檢討當時黨內的思想傾向問題。12月6日至13日，大會休會，黨、政、軍三個系統分別召開地委、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專員、縣長聯席會議，軍政幹部會議，根據大會精神檢討各自部門的工作。12月16日，大會請康生做了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19日請葉劍英報告了華北抗日鬥爭的情況。

（三）今後工作問題

12月20日開始，高幹會轉入對今後工作問題的討論，從思想上着重於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確定邊區黨今後的中心任務；其二，黨的領導如何適應今後的任務而轉變。討論的底本是毛澤東為大會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

題》，由賀龍口頭傳達書面報告。毛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心的或者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來說，就大多數同志說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而有意義。」^④謝覺哉在日記中數次很簡略地記述了高幹會的相關情況，其中提到最多的是這個小冊子及財經問題，充分體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特別關注^④。會議討論的目標就是將大家的思想統一到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上來。為了進一步突出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會議特於閉幕前就近年來領導經濟建設「成績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眾中有信仰」的幹部中選拔王震等二十二人予以隆重獎勵。毛為獲獎者逐一題字留念，會後《解放日報》在頭版發布消息，介紹受獎者事迹，還配有其素描畫像，並配發社論〈向領導經濟建設受獎同志學習〉^④。

之所以在一次以整風為主題的大會上，將經濟工作擺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基本原因在於此時邊區處於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自1939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國共之間摩擦增多，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則是摩擦嚴重激化的表現，並且自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不僅停發八路軍所有軍餉，還開始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嚴厲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此外，有數個原屬邊區的縣份被國民黨先後佔領，邊區地盤不斷縮小，人口也在減少。如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所言：「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及1941年，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國民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④由此，此次高幹會提出將「發展經濟，保障供給」^④作為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並指出在會後將要進行「嚴格的精兵簡政」，「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或局部的」^④。

1943年1月後，高幹會進入總結階段。彭真、劉少奇、任弼時先後作了領導問題的報告。1月13、14兩日，高崗作了大會的總結報告。他將西北近二十年的政治社會歷史和邊區黨的歷史進行了簡要回顧，對於過去的爭論為何是路線的爭論，錯誤的路線如何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等會議所涉問題進行了再次闡發，並告誡知識份子要自覺與下層人民、與槍桿子結合，以免重蹈主觀主義覆轍^④。高崗講畢，即由毛澤東、朱德、李鼎銘相繼致詞，最後由林伯渠致閉幕詞，大會至此結束。

從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歷時近三個月的高幹會實際上解決了三大問題：清算邊區黨的歷史；統一對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認識；確定今後的中心工作任務。這三大問題雖然性質各不相同，但都統一在這樣的脈絡中：通過解決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應對邊區當時的困難及未來的發展上去。

三 會後：各方評價積極

儘管在會議過程中唇槍舌劍、激烈交鋒，甚至不乏面紅耳赤，但高幹會的結果卻讓大家普遍感到滿意。高幹會結束時已到農曆臘月初十，年味漸

濃，1943年2月5日正月初一，欣逢立春，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爆竹、年畫、紅燈比去年熱鬧，表現民生已比前富裕。黨政機關人員相互拜年。陽曆團拜，帶點強制意。古曆元旦沒人約會，自然地互相道賀。」^{⑤⑩}輕鬆愉悅的心情和氛圍溢於言表。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接見從前方到延安學習的軍事幹部時說的一番話，可能道出了其中的緣由：「你們當旅長、團長的同志，在整風中不要怕丟臉。下級對你們有意見，讓他們統統講出來，他們窩在心裏的怨氣全吐出來，心情就舒暢了。你們再把架子放下來，如實地向群眾檢討反省一番，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就改善了，內部就更加團結了。」時任晉西北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的一席話，使我們心中豁亮了。」^{⑤⑪}劉懋功回憶說自己是直性子，憋不住話，就公開向他的頂頭上司——警一旅旅長兼關中警備司令員（似為文年生）提出批評，認為他對部隊防區劃分等方面不公平。劉說他的意見提得比較直率，措詞也比較尖銳，任弼時聽得很專注，並且一直在本子上記錄。當天的會議簡報還把他的這個發言刊登了^{⑤⑫}。平心而論，劉所提的意見難說與「不正之風」相關，更多的還真是「怨氣」，但發出來了，他的氣也就順了，也就能以更好的精神狀態投入到工作中去。師哲在憶述中也稱會議「批判了錯誤的做法，統一了認識，給受委屈的同志順了氣」^{⑤⑬}。

高幹會閉幕後的主要工作是傳達和落實會議精神。1月29日，西北局邀請黨外人士座談，由賈拓夫、謝覺哉出面，向李鼎銘、柳湜、賀連城、霍子樂等通報高幹會經過及內容，並聽取大家的批評與意見。李等聽後都很振奮，一致表示願與共產黨關係更親密，希望以後凡非中共黨內問題，都應事先與他們商談，同時對過去向他們談得不夠表示了某些意見^{⑤⑭}。毛澤東很快積極回應了李等的意見^{⑤⑮}。高幹會開過以後，各縣都召開了幹部會議，傳達高幹會的主要內容，並以高幹會的精神檢討工作、布置工作。4月8日的《解放日報》就集中報導了安塞、鄜縣、志丹等縣的會議情況，5月5日又集中報導了固臨、延川、延長、赤水、子長、鎮原等地的會議情況。總的來看，各地的會議都開得比較長，少則六天，多則十幾天^{⑤⑯}。

同年1月31日，《解放日報》頭版整版刊發高幹會的消息，並配有高崗、陳正人、林伯渠、賀龍等四人的素描畫像。這是會議首次向外公開。消息引用高崗的話，說這是「邊區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會議，這是一個學校」，與會同志普遍認為這次大會「不但大大解決了實際問題，並且大大的勝過在學校住兩年」^{⑤⑰}。賈拓夫向記者詳談了高幹會的經過與收穫，簡單講是「歷時三個月解決了三個大問題」。報導還特別提到主席團為幫助大家研究，將代表當時錯誤路線的文件摘要翻印，與會者拿整風文件同這些文件對照來看，是非功罪，倍覺明顯^{⑤⑱}。張秀山也表達了類似的體會，他說：「開完了高幹會，我感覺自己是真正被提高了一步。尤其寶貴的，是會議的全部工作，以活生生的榜樣，告訴了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⑤⑲}

這種通過會議教育、訓練幹部的方式在後來顯然得到了延續和進一步發揮。例如1945年晉冀豫區武委會在關於培養幹部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哪怕是能力稍差，也應大膽提拔起來，不應過於顧慮能力太弱等就不敢大膽提拔，

必要時可不斷採取開會方式進行短時期的訓練。」⁶⁰此外，高幹會上批評的自由主義作風也有了改變，安塞縣的會議中間恰逢過舊曆年節，大會休會三天，主席團通知回家過年的同志，三天就來，正月初二大家真的就來了。而在過去有些同志回家過年，一直過了十五還不肯來⁶¹。

3月4日，《解放日報》頭版發布了社論〈高幹會與整風運動〉，系統總結了高幹會成功召開的經驗。社論認為，要貫徹整風運動首先必須把它與實際結合，整風一旦脫離實際，就成為無的放矢，就不會得到任何的收穫；要貫徹整風運動，必須正確運用黨內民主，充分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要貫徹整風運動，對於黨內黨外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必須着重於思想檢討；要貫徹整風運動，必須倡導布爾什維克所特有的那種學習精神，這次高幹會就是一個集體學習集體創作的大會，就是一個學校⁶²。社論中提到高幹會是「集體學習」、「集體創作」的大會，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這是一般的會議所不具備的功能。

四 組織程序與議事方式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整風運動分地區分系統進行，而西北局高幹會如毛澤東所說是「整風學習的考試」⁶³，也如任弼時所說是「一次黨性測驗的大會」⁶⁴。之所以首先選定西北局來進行整風學習的「考試」和「測驗」，是緣於該局的特殊地位。李維漢稱毛曾和他說「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⁶⁵；任弼時說得更明確⁶⁶：

陝甘寧邊區是唯一的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而到今天還保存着的區域，是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兩個階段而且有鞏固的黨的區域。同時，它又是黨中央所在地的區域。因此陝甘寧邊區是有它特殊的地位的。……這個區域裏的一切重要設施，對於其他根據地有一種先導的模範的作用，要為其他根據地所效法。

從整風運動的全域來說，西北局顯然是最為合適的切入口。實際上，參加本次會議的除了西北局的高級幹部，當時在延安的中央幹部也大多出席了會議，並在大會作報告、發言，毛更是親自指導和參與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制訂的政策也不局限於西北局，而是具有全域性的意義。會後的宣傳落實工作也印證這一點，賈拓夫關於高幹會對記者的談話文稿既在《晉察冀日報》全文刊出，也在《新華日報》華北版全文刊出⁶⁷。《晉察冀日報》還全文轉載了《解放日報》關於西北局高幹會的社論⁶⁸。

高幹會的特殊性還在於這是中共在歷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高規格的會議。此前，中共雖然先後召開了六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除了國共合作期間的幾次大會，其他幾次要麼秘密召開，要麼在境外召開，難得在一個正常安定的環境開一次大會。1928年六大之後，遵義會議、

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都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會議，不過，這些會議都是政治局會議，至多也只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參與人員與層級相當有限，會議議程也相對集中。在高幹會之前，一再延期的七大再次進入籌備，且基本準備就緒，但受限於時局等因素，仍然未能如期召開，而此時距六大已有十幾年了。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創的黨代表大會年會制來衡量^⑥，這顯然是不正常的。高幹會召開之際，陝甘寧邊區實際上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在日寇的不斷擠壓下，根據地日漸縮小，人口也大幅減少，經濟極其困難。賀龍在高幹會上發言說：「召集這樣大的一個會，尤其是在整風期間開這樣的會，要花多少錢，光是伙食每天每人就是60元。」^⑦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會議的形式可以起到解決問題，凝聚共識，共克時艱的效果，還能對與會者起到教育作用，鞏固和加強黨組織建設——總之，這次會議的召開適逢其時。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內教育和黨內整風在當時的背景下也有其明顯的必要性。

西北局高幹會除了解決中共黨內幾大具體問題外，還體現出良好的精神風貌。高幹會原計劃會期為二十天，最後實際會期長達八十多天，嚴重超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會議議程相較原計劃發生較大改變。比如會議組織者原本大概沒有料到陝北地方黨的歷史問題會引起如此熱烈的交鋒，而在實際的進程中發現這一問題無法簡單處理，因此，會議主席團因勢利導花了較多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有關問題。正是由於這種相對開放和寬鬆的議程設置，使得會議過程中發表意見者眾多，且從發言記錄來看普遍篇幅較大^⑧。儘管是長篇大論，但空話套話很少，發言者都是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來談相關的問題，非常細緻具體。

此外，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發言者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真正做到暢所欲言。即便是主要的被批判對象朱理治，不僅獲准先後兩次發言，還有機會給任弼時、高崗和大會主席團寫長信，進一步闡明相關問題^⑨。同樣受到較多批判的郭洪濤在回憶這次會議時說：「會上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是完全應該的，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動而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⑩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甚麼會議閉幕後許多人都感到心情舒暢、心中豁亮。

不僅如此，在發言中與會者還普遍非常坦誠地講述了自己所經歷的或者聽聞的各種情況，包括自我的檢討和對別人的批評，其中對上級的批評尤為引人注目。這樣對於上級了解情況也大有裨益，毛澤東在報告中就指出：「比方這次解決歷史問題，沒有這十一天的會議，沒有你們貢獻的材料，暴露了這樣的事實，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⑪這背後其實關涉到一個黨內常常被忽略的問題，也就是下級對上級批評的渠道和方式應該是怎樣操作。儘管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在同級之間相對容易操作和實現，但在上下級之間恐怕「集中」會超過「民主」。這次會議算是為下級對上級表達意見和展開正常批評作了一個表率。換言之，共產黨人要真正做到《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所說的「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需要一個正常的、良好的組織氛圍。

這次會議在解決黨內分歧和形成共識方面具有典範意義。在此之前，中共在歷史上也出現過重大分歧和激烈鬥爭，最後一般在外部力量的主導下或

內部高層小範圍討論議決、對錯誤進行定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八七會議」定下的）和「立三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定下的）就是按照這種方式來定性的。相較之下，本次會議對陝北肅反問題的處理方式則明顯不同。會議並沒有一開始就定性，而是首先進行充分的討論，當與會者將矛頭紛紛對準具體的當事人時，才適時將之引導至路線原則問題的討論上來。這種做法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優長：首先，廣大與會者親自參與討論和定性，可為達成共識奠定基礎；其次，這種方式對與會者處理其他問題有積極的教育意義；最後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把歷史過錯提升至路線方針層面，能有效避免走入對具體個人進行道德品質評判的死胡同，而這對中共實現自我糾錯以及維護其組織文化大有裨益。出現重大分歧和不同意見時，讓各方充分發表意見，親自參與到問題的討論中來，而不是上級作出決定下級遵照執行——那樣對錯誤或分歧的認識顯然不如前者徹底和深刻，甚至暫時平息的矛盾或被掩蓋的問題在日後還會再次爆發出來。陝北黨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教訓，本來在1935年11月中央黨務委員會即對這段歷史做過結論^⑥，但由於不能服眾，以至於無法迴避，因而在高幹會中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

本次會議對與會者的教育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會議所遵循的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如前所述，在會議開幕前各部門就做了大量籌備工作，其中重要一環是各方面的組織進行實地調查和廣泛徵求意見。會議過程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民主作風，與會者嚴肅認真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結束後各地亦開會落實會議精神，討論本地工作，許多與會者就發現這次會議與以往很大不同——「這次會議是真的要檢討了！」「說出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和不敢說的事！」「領導人都那樣地把缺點講了，咱還怕甚麼！」^⑦由此也可看出，上級組織對於引領良好的組織氛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對於具有龐大層級體系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最高層的行事方式可以對全黨形成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五 餘論

儘管西北局高幹會達到了多方面的預期效果而「圓滿結束」^⑧，然而就在高幹會結束後不久，邊區各機關、單位、學校即掀起了抓特務、叛徒的狂潮，原本生動活潑的延安轉瞬陷入萬馬齊喑、人人自危的境地。當然，這個轉折在高幹會中已有苗頭，如康生的鋤奸報告已在渲染延安「特務如麻」^⑨。這個轉折過程是如何完成的，還需要更多的探究，但前後的巨大反差至少表明，以會議的形式，遵循一定的組織程序，採取開放的方式，不預設結論，領導者保持克制，允許各方面充分表達意見，顯然更有助於中共解決黨內問題，也更有可能導向一個良好的結果。由此，高幹會的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在後續整風運動中為甚麼未能得以延續，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與之相關，康生所謂的「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⑩，是否果真如此，也值得質疑。進而言之，對於高幹會所代表的議事模式究竟有怎樣的缺陷，是否也應當進一步追問？

註釋

- ① 毛澤東給周恩來、林彪的電報，1943年2月9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陳雲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347。
- 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84。
- ③ 閻樹聲、胡民新：〈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西北局高幹會〉，《人文雜誌》，1992年第6期，頁66-72；魏德平：〈延安整風對「陝北肅反」的重新定性〉，《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3期，頁16-29；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的背景〉，載石川禎浩編：《中國社會主義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現代中國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報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0），頁153-214。
- ④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417-19。
- ⑤⑦⑧⑨⑫⑬⑭⑮⑯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24；425；434；435；435-36；435；411；436；439。
- ⑰⑱⑲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558；596-97；598；595。
- ⑩ 毛澤東給聶榮臻的電報，1942年7月4日。轉引自《陳雲傳》，上冊，頁343。
- ⑪ 〈中共西北局於十月五日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重要通知〉（1942年9月1日），原件藏中共中央西北局舊址紀念館。感謝延安大學賀永泰、楊利文二位老師惠賜材料。
- ⑫⑬⑭⑮ 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39-1945（抗戰勝利前在延安）》（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152；149；151；151。
- ⑯⑰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公仲、劉金菊著：《陳正人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73；77。
- 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84。
- ⑳㉑ 宋金壽主編：《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頁677。
- ㉒ 毛澤東致陳正人信，1942年10月27日。轉引自《陳正人傳》，頁78。
- ㉓⑳㉔㉕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的經過與收穫——西北局賈秘書長拓夫談話〉，《新華日報》（華北版），附刊，1943年3月3日。
- ㉖ 相關的詳細過程參見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402-15。
- ㉗㉘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141；141-42。
- ㉙㉚㉛ 張秀山：〈高幹會雜記〉，《解放日報》，1943年3月18日。
- ㉜ 高華認為這種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為綱的鬥爭是總結黨的歷史的新思路與新方法，是高幹會的一大開創性貢獻。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629。應該注意到，「政治路線」其實是早已有之的慣用語，列寧早在1912年即專門論述過政治路線，參見〈論政治路線〉，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108。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在1930年代即有「立三路線」的提法。鑒於此，本次會議上的「正確」、「錯誤」路線的提法應該說是沿襲了這一傳統。
- ㉝ 有研究指出，在當時中共系統中，口頭報告甚為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幹部文化水平低下，閱讀能力較差，口頭講解比書面文字更容易傳達和接受。參見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構成與局限〉，《社會科學》（上海），2013年第3期，頁153。
- ㉞㉟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頁402-13；414-15。
- ㊱㊲ 劉懋功：《夢回吹角連營：一個老戰士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08；109。
- ㊳ 陳光：〈到毛主席身邊去演戲〉，載咸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烽火文藝勁旅：陝甘寧邊區關中八一劇團回憶紀實》（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56。

- ⑳ 毛澤東：〈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942年11月21、23日。毛的講稿至今未經官方核定正式出版發行，此處引自〈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高幹會議上的報告：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黃土情聯誼會網，www.htqly.org/detail.aspx?DocumentId=3195。
- ㉑㉒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464；553-54。
- ㉓㉔ 毛澤東：〈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942年11月21、23日。
- ㉕ 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出版地不詳：大眾日報出版社，1943），頁71。該報告由賀龍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幹會議作了傳達。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474。
- ㉖ 參見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42年12月30日（頁371）、12月23日（頁372）、12月29日（頁373）、12月31日（頁373）及1943年1月12日（頁382-83）。
- ㉗ 〈西北局獎勵廿二位生產英雄 溺職人員分別懲處〉、〈社論：向領導經濟建設受獎同志學習〉，《解放日報》，1943年2月3日。
- ㉘㉙㉚ 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頁2-3；1；1。
- ㉛㉜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頁394；391。
- ㉝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頁222。
- ㉞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154。
- ㉟ 〈高幹會傳達在各縣〉，《解放日報》，1943年4月8日、5月5日。
- ㊱ 〈整風與實際相結合 邊區高幹會勝利閉幕〉，《解放日報》，1943年1月31日。
- ㊲ 〈歷時三個月解決了三個大問題〉，《解放日報》，1943年1月31日。
- ㊳ 晉冀豫區武委會：〈關於調整與培養幹部指示〉（1945年10月2日），載太行區武委會編：《抗日戰爭中人民武裝建設文件》，下冊（出版資料不詳，1947），頁307。
- ㊴ 〈高幹會與整風運動〉，《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3月4日。
- ㊵㊶ 任弼時：〈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高幹會講稿），1943年1月8日至11日。詳見〈1943年1月任弼時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議上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黃土情聯誼會網，www.htqly.org/detail.aspx?DocumentId=3197。
- ㊷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499。
- ㊸ 〈中共西北局高幹會的經過與收穫——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同志對記者談話〉，《晉察冀日報》，194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的經過與收穫——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談話〉，《新華日報》（華北版），附刊，1943年3月3日。
- ㊹ 〈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與整風運動〉，《晉察冀日報》，1943年3月16日。
- ㊺ 在蘇俄時代，即便在外地入侵和內部叛亂的情況下，列寧始終堅持了黨代會年會制，從1918至1923年先後定期舉行了六次黨代會，即黨的七大到十二大。
- ㊻ 劉秉榮：《賀龍全傳》，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2217。
- ㊼ 僅就關於陝北肅反的發言來看，張秀山在「身體不太好，不能多講話，只簡單地發表一點意見」的情況下第一次發言也達16,000言，第二次發言又近8,000言。還有，王世泰近10,000言，賀晉年13,000言，李景波9,000言，郭述申14,000言。以正常語速計，這些發言都至少需要一個小時。相關發言文字稿可參見黃土情聯誼會網，「歷史文獻」欄目，www.htqly.org/ListDocuments.aspx?CategoryId=12。
- ㊽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82。
- ㊾ 有關該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魏德平：〈延安整風對「陝北肅反」的重新定性〉，《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3期，頁16-29。
- ㊿ 〈高幹會傳達在各縣〉，《解放日報》，1943年4月8日。
- ㊽㊾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247-48；249。